

学习型社会中90后学习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易小娟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建设学习型社会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普遍化参与。成长于社会发展和转型时期的90后, 学习已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分析发现, 越多接触新媒体、受教育程度高、未婚的个体行动者, 越倾向于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学习; 是否居住在城市、父辈的受教育水平, 以及对社会公平认知等因素并不显著影响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鉴于此, 建设学习型社会应注意社会个体特征差异, 针对差异性提出激发社会成员学习意愿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 学习型社会; 90后; 学习意愿;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21)03-0044-07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earning Intention of the Post-1990s in the Learning Socie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GSS2015 Data

YI Xiao-juan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members. For people growing up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after 1990s, learning is a way of life. It is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ho are more exposed to new media, highly educated and unmarried, are more likely to study in the free time. Factors such as living in a city,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parents and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 do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learning willingness of the post-90s group.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can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to stimulate the learning willingness of social members.

Key words: learning society; post-1990s; learning willingness; empirical study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学习型社会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学习型社会的实质是以学习求发展^[1]。党和国家基于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了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指出到2020年, 我国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2]。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 党和国家起着重要的

领导和指挥作用。所有外部条件将通过影响社会成员的学习意愿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建设者来自社会个体, 社会成员愿意学习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根本前提^[3]。只有社会成员具有内在的学习意愿, 外在因素才有可能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发挥作用。

成长于社会发展和转型时期的90后群体, 学习已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第一财经商业数据

中心发布的《2018 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指出，90 后有很强的意愿不断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提升自我，开拓视野，增加技艺。以沪江为例，平台上 90 后用户占比超过 70%^[4]。90 后群体一直是社会密切关注的群体。他们出生于经济腾飞的 20 世纪 90 年代，受益于改革开放，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与日俱增。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更能感受到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想在社会中保有竞争力，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用各种机会，更新、充实和深化最初获得的知识，使自己不断适应变革的世界^[5]。

建立一个满足人们终身学习意愿的学习型社会，是现代教育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6]。目前，对学习型社会的宏观设想比较多，但从社会成员个体入手的研究比较少，更缺少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学习意愿的分析。为此，本研究将探讨影响 90 后学习意愿的因素，分析不同个体特征下的 90 后青年学习意愿是否存在差异，进而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些许参考策略。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学习意愿表现为个体对学习行为的主动选择倾向^[7]。意愿作为学习的动力，具有倾向性，影响着个体能否主动开展学习活动。同时，学习意愿本身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与学习意愿之间的关系引起不少学者关注。有学者认为，较高层次的教育经历可能会阻碍学习者学习意愿的发展。例如，孙平认为许多成年人可能由于以前学校课堂中的不愉快经历而不愿意参加终身学习活动^[8]。一般来说，学校教育应使得学习者走出校门之后还具备足够的学习意愿^[9]。学习者具有较高层次的教育经历，对今后的继续学习也会产生正面且持久的影响。胡威认为，不同学历层级的人有明显不同的感受，高学历的人在学习意愿方面会更强烈一些^[10]。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具有内在动力保持对学习的热情，以至于在毕业后仍有持续学习的意愿。如果进一步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解释学习意愿，那么在自由时间里拥有的持续学习意愿可以视为一种阶层品味。另外，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意愿，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90 后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学习意愿越强。

假设 2：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 90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

婚恋与学习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已有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婚恋观、婚恋与学业之间关系，研究对象集中于在校大学生。例如，有研究表明婚恋状况和婚姻家庭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科研能力以及学业生活等^[11]。那么，当人们真正参与婚姻生活后，其学习行为选择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有研究曾统计过未婚者和已婚者每天的学习时间，指出“不在婚者的学习时间长于在婚者的学习时间，两性皆是如此。”^[12]一般来说，未婚群体与已婚群体相比，在学习时间上更具有优势，或许更具有学习意愿。因此，本研究继续提出一种假设。

假设 3：婚配与否会影响 90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

居住地区对于成人学习活动意愿的强弱有着明显的影响^{[13]26-27}。不同的居住地，为普通民众提供的学习条件、学习资源存在差异。有调查发现，教育资源的城乡分布差异严重，具体表现在教育经费以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14]。这些由于居住地带来的差异影响着学习者的行为选择。故本研究提出第四种假设。

假设 4：相比于农村 90 后，居住在城市的 90 后更可能选择学习充电。

大众传媒的演进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对于成人学习者来说，接触媒体、寻求有效的信息已成为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一部分^[15]。近些年，出现了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16]。新媒体的出现，带来在线学习。网络学习以其便捷和丰富的资源获得大大降低了学习时间和费用，迅速获得了广大学习者的青睐。为此，本研究提出第五种假设。

假设 5：90 后群体接触新媒体程度越高，学习意愿越强。

社会公平感反映人们对当前社会重要资源分配状态的评价^[17]。黄艳敏等研究者从机会公平这一维度对学习意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机会公平实现人群更容易产生学习充电的内源动机与外源动机，学习意愿因此突显”^[18]。如果个体能够建立起与回报对等的社会公平认知，很有可能会促使个体拥有更为强烈的学习意愿。本研究提

出第六种假设。

假设6:社会公平认知会影响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为依据,选择出生年份在1990—1999年间的人群(统称为“90后”)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测量90后群体在空闲时间放弃休闲娱乐、选择学习充电的行为倾向,并分析影响90后群体学习的显著性因素。在筛选样本时,考虑到在校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常规性地剔除对纳入变量模型涉及问题未做有效性回答的个案,进一步筛选最后学历早于2014年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548个。

(二) 变量及界定

因变量是学习意愿。本研究对学习意愿的描述来自CGSS2015对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做下面的事情—学习充电”的回答。1到5分别表示从“从不”到“非常频繁”,不同的频次选择反映着个体在空闲时间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上的偏好差异。

自变量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父辈受教育程度、媒体使用情况、社会公平认知。

在个人受教育程度方面,将它转换为“教育级别”的类别变量,重新赋值处理后,“1”表示“初中及以下”,“2”表示“高中、中专及技术学校”,“3”表示“大专及以上”。

在父辈受教育程度方面,取自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最大值。受教育程度也是从“1”排列到“3”。“1”表示“初中及以下”,“2”表示“高中、中专及技术学校”,“3”表示“大专及以上”。

在婚姻状况方面,“1”表示“未婚”,“2”表示“已婚”。

居住地分为农村和城市,分别赋值为:“1”和“2”。

在媒体使用方面,由题目“在过去一年中,以上哪个媒体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来描述,答案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类。其中,

传统媒体以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代表,新媒体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用“1”和“2”分别表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数值越高,表示受访者接触新媒体的程度越高。

公平认知是人们对努力和回报之间是否对等原理的一个主观认知。对应于CGSS2015中的“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1=完全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3=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4=比较公平,5=完全公平),结果逐渐趋于肯定。表1为样本各个变量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居住地	1.65	0.476	1	2
受教育程度	1.94	0.845	1	3
媒体使用情况	1.83	0.374	1	2
婚姻状况	1.38	0.485	1	2
父辈受教育程度	1.33	0.588	1	3
社会公平认知	3.09	0.976	1	5
学习意愿	2.38	0.99	1	5

四、数据分析

(一) 90后群体学习意愿的现状分析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我国90后群体平均学习意愿为2.38。其中,居住于城市的90后平均学习意愿为2.51,居住于农村的90后平均学习意愿为2.12。城市青年的学习意愿强于农村青年,学习意愿存在城乡差异。90后群体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具有的学习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从初中及以下的1.91到大专及以上学历的2.89,其学习意愿越来越强烈。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在父辈受教育程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也在增强。另外,未婚的青年(2.57)明显比已婚青年(2.06)更有学习意愿。90后青年对社会公正的感知情况分为五种,从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2.24),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2.28)最后到完全公平(3.13),青年的学习意愿愈发强烈,有着不同社会公平认知的青年之间的学习意愿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90 后群体学习意愿的方差分析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F 值	sig.
居住地	农村	190	2.12	19.925 ***	0.000
	城市	358	2.51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13	1.91	58.393 ***	0.000
	高中、中专及技校	155	2.41		
	大专及以上	180	2.89		
媒体使用情况	传统媒体	92	1.78	42.7 ***	0.000
	新媒体	456	2.5		
父辈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02	2.26	13.179 ***	0.000
	高中、中专及技校	112	2.61		
	大专及以上	34	3		
婚姻状况	未婚	342	2.57	36.137 ***	0.000
	已婚	206	2.06		
社会公平认知	完全不公平	33	2.24	2.451 *	0.040
	比较不公平	130	2.3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145	2.28		
	比较公平	232	2.47		
	完全公平	8	3.13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二) 90 后群体学习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建立模型之前，本研究首先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如表 3 所示。

表 3 对受教育程度等自变量与因变量学习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

自变量	配对相关系数 (显著性)	偏相关系数 (显著性)
受教育程度	0.42 (0.00)	0.283 (0.00)
居住地	0.188 (0.00)	0.014 (0.746)
父辈受教育程度	0.215 (0.00)	0.045 (0.294)
婚姻状况	-0.249 (0.00)	-0.137 (0.001)
媒体使用	0.269 (0.00)	0.131 (0.002)
社会公平认知	0.101 (0.018)	0.069 (0.109)

单纯计算配对相关系数，诸如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父辈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媒体使用、社会公平认知等自变量和因变量，学习意愿均呈

显著相关。其中，只有婚姻状况这一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其余的自变量与因变量都是正相关关系。随后控制其他自变量，实施偏相关分析发现，居住地、父辈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公平认知这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几乎没有了，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014、0.045、0.069。因而可知，居住地、父辈受教育程度、社会公平认知与 90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大程度是依附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媒体使用等三个自变量。因相关程度不明显，为获取最优模型，需进一步实施共线性检验。基于逐步回归后，发现加入居住地、父辈受教育程度和对社会公平认知后，均无法有效增强模型解释力。表明这三个变量是从属变量，会随着其他自变量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于是，剔除居住地、父辈受教育程度和对社会公平认知三个变量后，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达到最佳。由此可得，基于本数据无法验证假设 2，即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 90 后青年的学习意愿；同时，也无法验证假设 4 和假设 6，难以得出城市 90 后青年和对社会公平认知感更高的人，越有可能在闲暇时间选择学习充电。

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对数据实施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用个体受教育程度、媒体使用情况、婚姻状况三个变量来建立模型,预测个体在空闲时间选择学习充电的倾向。

表4 关于90后群体学习意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个体受教育程度	0.492*** (0.045)	0.435*** (0.048)	0.403*** (0.048)
媒体使用情况		0.386** (0.108)	0.333** (0.108)
婚姻状况			-0.264* (0.082)
截距	1.421*** (0.096)	0.824*** (0.192)	1.347*** (0.25)
R ²	0.176	0.195	0.211
调整R ²	0.175	0.192	0.206
F值	116.984***	66.174***	48.369***
考察的个体数	548	548	548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括号中是标准误。

模型1只考虑个体受教育程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个体受教育程度对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在空闲时间选择学习充电的可能性也越大。模型2引入变量媒体使用情况,较大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同时,当控制接触大众传媒的程度保持不变后,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意愿的影响就降低了。可见,在网络时代,个体受教育程度与接触大众传媒的程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模型3说明婚姻状况对个体学习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且呈现为负相关。表4的数据证实了假设1,即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会越倾向于在闲暇时间选择学习充电。另外,也证实了假设3,即婚配与否会影响90后闲暇时间的学习意愿,且未婚的90后青年比已婚的90后青年更具有学习意愿。还证实了假设5,即越多接触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就越可能有较强的学习意愿。

五、发现和总结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受教育程度高、越多接触新媒体、未婚是影响90后群体学习意愿的显著性因素。更深一步分析后发现,在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过程中,可通过提升自我学习能力、拓宽学习资源获取方式以及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提振社会成员的学习意愿。

(一) 发挥现有教育体系的作用:培育学习者的终身学习能力

个体原有的受教育经历会对成年后的学习产生影响,假设1得到证实。这说明90后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意愿愈发强烈。此外,不同等级的学校教育对90后青年的学习意愿也存在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毕业后主动选择学习行为的越多。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的侧重点在发生变化。基础教育更多在于知识的传授,获取基本的生活常识。而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知识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更加注重提升人的思维。由此,可拥有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加主动地去获取美好生活。人的心智趋向成熟使得学习行为由自发走向自觉。走出校门,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面向社会的起点。现有的教育体系仍旧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力,不过要从先前的重教转向重学,注重学习者的学习体验。

此外,父辈受教育程度,并不能对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需要客观地看待90后这一群体的行为特征。90后群体个性丰富,思想独立、开放、有主见,能以更加平等和民主的观念对待个人与父辈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父辈,90后对一些具体的事物、切身的利益更加关注,对生活的认识更加现实,对自身也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更加明确的定位^[19]。其次,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下,父代家庭对90后群体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启蒙环境。学校教育造就了90后群体,他们的生活世界、成长经历基本与学校生活浑然一体^[20]。学校教育要突破传统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品质和核心技能,培养学习者的终身学习的能力。

(二) 利用新媒体的整合功能:拓宽学习资源获取方式

90后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新媒体技术所营造的泛在学习环境,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获取所需任何信息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活动。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可以十分便捷地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源。学习机会是多样而开放的,个体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因而,接受新媒体的程度对90后学习意愿具

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新媒体给予人丰富的视听体验,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增强了学习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缩小了城乡之间信息资源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居住地对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先前,人们居住的场所不同,其教育资源的利用和信息的获得以及社会氛围就会有一定的差异^{[13]26-27}。而在新媒体时代,学习时空更有弹性,学习者更能有效分享学习经验。在新媒体的环境下,能够实现教育参与者的多样化,教育信息资源来源的多渠道化,教育内容更新的常态化^[21]。通过在新媒介的学习,不受时空限制,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可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利用。同时,由于网络上的一些信息良莠不齐,容易对社会成员造成不良影响。在利用新媒体便捷、迅速的强大功能时,国家要注意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尽可能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三) 有效利用家庭时间:营造生活学习化的家庭氛围

90后群体的学习意愿在婚配与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从生命周期来看,个体一旦步入婚姻,必将付出一些时间用于家庭生活。尤其是进入育儿阶段,挤压掉更多的自由时间。未婚群体承担的家庭责任要少一些,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非工作时间。而已婚或已婚已育群体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少,大部分时间要陪伴孩子或家人,这是在所难免的。

婚配与否与学习意愿之间的显著关系不只单纯意味着两个群体在时间和精力上的差异程度,更意味着个体的学习未能与家庭生活之间实现动态协调发展。在学习型社会中,学习场域不再局限于学校,处处都是学习场域。学习型社会也是由一个个学习型组织构成的。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自然也应罗列其中。在学习型社会构建过程中,创建学习型家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学者厉以贤认为,学习型家庭是以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通过家庭全体成员持续的、终身的自我导向性学习、互动学习及共享学习成果,实现个体和家庭动态协调发展^[22]。以往,只是强调长辈对晚辈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家庭中应当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营造一种终身学习的氛围,强化家庭成员的学习动机。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甚至是邻里之间都可以家庭小组的形式进

行学习。一般学习的内容可以包括环境教育、文化教育、亲子教育、投资理财教育和人际关系教育等^[23]。家庭成员在彼此间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养成共同学习的习惯和方法,促进整个家庭的成长和发展。

因此,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受教育程度高、越多接触新媒体、未婚是影响社会成员学习意愿的表层因素。实际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将与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为社会成员的学习行为选择赋予一定的意义,如学习者的终身学习能力、学习资源的获得以及生活学习化的家庭氛围等。这些都将是有益于建成一个“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参考文献:

- [1] 顾明远,石中英.学习型社会:以学习求发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5-14.
- [2] 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20-09-20].http://www.gov.cn/jrzq/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 [3] 范高林.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动力机制[J].中国成人教育,2005(8):9-10.
- [4]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2018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EB/OL].(2018-12-20)[2020-09-20].<https://www.cbndata.com/report/1239/detail?isReading=report&page=1&readway=stand>.
-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75.
- [6] 袁静.终身教育:实现人的自我完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8):355-357.
- [7] 潘菽.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76.
- [8] 孙平.“学习型社会”的挑战与高等教育的应答[J].高校教育管理,2007(4):20-23.
- [9] 陈廷柱.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若干问题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8(8):1-16.
- [10] 胡威,蓝志勇,杨永平.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学习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3,10(4):68-77,140.
- [11] 黄萱.研究型大学女硕士研究生的婚恋及其学习影响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58.
- [12] 杨菊华,张娇娇,吴敏.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1990-2010年国民学习时间的性别差异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5(6):24-32.

- [13] 马小健,谢怡.影响成人学习的动机因素分析[J].成人教育,2003(11).
- [14] 王树元.成人教育资源的城乡不均衡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7(8):24-26.
- [15] 吴甜.新媒体时代成人学习方式的嬗变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80.
- [16] 王传中.新媒体对大学生生活、学习、思想的影响[J].高校理论战线,2009(7):40-41.
- [17] 孟天广.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J].社会,2012,32(6):108-134.
- [18] 黄艳敏,赵娟霞,张岩贵.社会差序格局提振抑或消解了民众学习意愿——来自CGSS2010的证据[J].中国经济问题,2018(4):100-110.
- [19] 于家明.“90后”青年群体特点及教育对策探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0(1):56-58,116.
- [20] 万美容,夏博艺,曾兰.“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90后”大学生视角的质性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3(10):52-56.
- [21] 周越辉.新传媒教育信息资源整合分析[J].情报科学,2016,34(5):55-58.
- [22] 厉以贤.学习社会的理念与建设[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274.
- [23] 夏燕.学习型家庭背景下家庭成人教育问题初探[J].教育学术月刊,2010(10):91-92.

(责任编辑:邢云燕)

(上接第13页)

历大的困难考验,绝大多数都是按父母的期待按部就班地成长,逐渐缺少了自主意识。来到军校后,学员们脱离了原本的生活环境,学校在对他们的管理中,在可控范围内,应有意识地做到“放手”,避免过分压制、干预和指令性的指导。有些本该学员自己考虑到的事情,队干部就不必主动督促提醒,要让他们为此承担相应后果。同时创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不断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责任意识和自主意识。

(四) 立足岗位、着眼能力,探索逆商培养与领导力结合的方法路径

军事任务多是艰巨的,所以逆商对于军官的领导能力至关重要。作为准军官的军校学员,应对逆境的能力不仅关系到其未来的自身发展,更与部队的战斗力息息相关。这就要求他们除了自己具备高逆商外,还要拥有带领部队抵御逆境、战胜逆境的领导能力。目前将逆商与领导力联系起来的研究还很少,与军校学员领导力培养结合的实践则更是鲜有。因此,将逆商与领导力培养有机结合,创新探索培养的方法路径,是对学员逆商培养的有益尝试。

逆商是个体习以为常应付逆境的一种方式,目前军校本科学员的逆商水平,还远不足以支撑他们肩负起强军兴国的重担。但同时这种应对方式是可以有意识的培养得到提升和改进的。军队院校应看到逆商培养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办法,帮助学员在任职前增强应对逆境

的能力,使他们在未来的任何困难挑战面前都能履行好职责使命。

参考文献:

- [1] 史托兹.逆商:我们该如何应对坏事件[M].石盼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 [2] STOLTZ P. Adversity Quotient [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1997.
- [3] 龚力.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AQ(逆境商数)的培养[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9(S1):127-129.
- [4] GEORGIA S. Reliability reconsidered; Cronbach's alpha and paediatric assessment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J]. Australian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 2009, 56(3): 151.
- [5] 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93.
- [6] 刘丹,石国兴,郑新红.论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心理韧性[J].心理学探新,2010(4):12-17.
- [7] 敖洁,邓治文,吴利存.大学新生逆境商数及挫折教育策略探讨[J].高等教育研究,2009,30(7):77-81.
- [8] 蔡文伯,杨丽雪.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策略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9,30(1):83-90.
- [9] BANDURA A.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2, 37(2): 122-147.

(责任编辑:赵惠君)